

绝

周 山著

学

近 现 代 的 先 秦 名 家 研 究



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丛书
周 山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

复

苏



绝

周 山著

学

近 现 代 的 先 秦 名 家 研 究

复

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学复苏/周山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12
(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丛书·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
ISBN 7-5382-4867-6

I. 绝… II. 周… III. 名家-研究 IV. B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8575 号

出版发行者/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责任编辑/俞晓群

封面设计/王建纲

责任校对/马 慧

印制者/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销者/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86 千字

印 张/9.25 插页/4

印 数/1—3,000

定 价/16.60 元

百家争鸣又一春

——《近现代先秦诸子研究丛书》序

这套丛书的问世，缘起于两年前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俞晓群、王越男、王之江诸兄来沪组稿，几位文友相聚，三句话不离本行。晓群兄漫不经意地问我：“搞一套近现代关于先秦诸子研究的书，你看如何？”我漫应道：“好主意。”越男兄接言：“这套书请你组织一下，怎么样？”我这才明白，这个课题设想，俞、王诸兄来沪之前就已经成竹在胸了。以后，晓群、越男兄多次来沪，细议此项计划。经一年左右的酝酿，此项课题终于付诸实施。

毫无疑问，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们是极具眼光的。

在漫长的中国学术史上，真正称得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只有两个。一在先秦战国时期，一在本世纪。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造就了儒、墨、名、道、法等众多学派，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熟。本世纪的百家争鸣，则是在引入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是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与重建。在近现代这场以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为基本

格调的百家争鸣中，被称为“国故研究”的先秦诸子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先秦诸子研究，基本上都把功夫下在对古籍的诠释疏解、考证训诂方面，因而对先秦著作的整体认识，对先秦思想家的理论体系的把握，对各学派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包括各专业史的整理，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维持了两千年之久的局面，大概就是汉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始终未能超越先秦、未能创造出一个像样的学术理论体系的直接原因。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由于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及其治学方法的影响，从一开始就注意到对先秦诸子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学术源流的历史考察，致力于对各种学术思想的整体把握，并由此发动了各专业史的研究。

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由于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开展的古文化研究，因而受到了新思想新观念尤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影响。人们不仅将西方文化作为先秦诸子研究中的比较对象，而且将西方文化尤其西方哲学作为解剖先秦诸子思想的工具。这种将中西学术思想做比较研究的工作，使先秦诸子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当然，在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中，也有不足之处，举要如：

一些学者在“与其信古，不如疑古、稽古”的观念下，对先秦古籍的真伪以及著作年代持过分怀疑的态度。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撰写了大量文字，对先秦诸子的许多著作进行真伪鉴别。由于心中先有了“疑古”的念头，稽古的结论几乎都是“伪作”，或者将著作年限大大推迟。70年代以来的田野考古

工作，无情地推翻了 20 年代以来被称为“疑古派”的权威结论。而这些疑古学者的轻率结论的直接后果，便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弥足珍贵的先秦古籍受到冷落，许多重要的代表作因为误判了著作时间而使专业史研究的脉络难以通畅。

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也常常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影响。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历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三大制度的更替。不同的社会制度，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需要。先秦诸子的不同身份，决定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需要中的不同遭遇。儒家由贬到褒，法家由褒到贬，随着政权的更迭，他们也像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变幻不定的环境里，从事先秦诸子研究的学者，要想保持一份平常心，神定气闲地开展纯学术研究，是不可能的。社会政治的制约力，使得近现代的诸子研究，时断时续，忽左忽右，负面作用自不待言。

有不少近现代学者被冠以“学贯中西”的美称，然而翻开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史，完全做到“学贯中西”的学者却很难找得到。由于对西方文化尤其西方哲学理论的理解未尽透彻，因而在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中，尤其二三十年代的早期研究中，简单比附乃至错误比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本来是想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以寻找移植西方科学之合适土壤、重建中国新文化的愿望，未能尽如人意。

进入 80 年代以来，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对近现代的先秦诸子研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总结，便成为深入开展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成为避免“重复劳动”和少走弯路的基础性工作。有

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大胆开拓了这个课题。

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一部学术著作是很不容易的，出版一套学术著作更不容易。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慷慨的支持。在本课题实施过程中，也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的厚爱和支持。

周 山

写于 1997 年 5 月 1 日

目 录

百家争鸣又一春

——《近现代先秦诸子研究丛书》序……………周山

绪 论 绝学复苏……………1

——近现代名家研究概述

一、绝学复苏的契机……………5

二、名家研究中的新方法……………7

三、名家研究中的主要成就……………9

第一章 汉书一锤难定音……………11

——近现代关于“名家”的争论

一、对“名家”的疑问……………14

二、关于“名家”对象范围的争论……………19

三、关于“名家”承传的讨论……………26

四、本章结语……………36

第二章 真真假假费猜疑……………38

——名家著作真伪考	
一、《邓析子》真伪考	40
二、尹文著作真伪辨	50
三、《公孙龙子》考证	66
四、本章结语	77
第三章 见智见仁辨“无厚”	84
——关于邓析的“两可”思想研究	
一、早期关于“无厚”之辞的争辩	85
二、重新评价“逻辑魔鬼”	90
三、“无厚之辞章”的80年代	94
四、本章结语	104
第四章 寻寻觅觅解命题	110
——关于惠施“历物之意”的研究	
一、学术渊源之争	111
二、“合”与“离”的歧见	121
三、“历物之意”寻觅	130
四、本章结语	157
第五章 名道两家争尹文	166
——近现代关于尹文的研究	
一、《白心》：从发掘到研究	167
二、《大道》：迟到的研究	174
三、本章结语	185
第六章 洗去污垢见真身	188
——近现代关于公孙龙的研究	
一、总体评价及《公孙龙子》篇秩分析	189
二、《名实论》：唯心还是唯物	203
三、《白马论》：逻辑还是诡辩	216

四、《指物论》：一根难啃的“骨头”	234
五、《坚白论》：没有句号的论争	244
六、《通变论》：“荒谬绝伦”还是“条理井然” ...	255
七、本章结语	263
结 语 回 顾 与 展 望	266
——关于近现代名家研究的若干思考	
一、初始愿望与实践结果	266
二、近现代名家研究的优点	270
三、近现代名家研究的不足	275
四、名家研究深入发展中应该注意的新问题	279
参考书目	286

绪论 绝学复苏

——近现代名家研究概述

先秦名辩思潮激荡二百多年，在我国学术史上首屈一指，蔚为壮观。

有人曾将先秦名辩思潮中的众多学者及其著述分析为四个学派：无名学派、正名学派、形名学派、立名学派；其创始人物，分别是老聃、孔丘、邓析、墨翟。

秦以后，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被尊为“官学”，旨在“正政”的正名学说风头愈健。不久，以老聃为旗帜的道家也跻身于庙堂，与儒家分庭抗礼，争宠于帝王家；其“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无名学说，得与俱荣。然而，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唱主角的“形名”与“立名”两家学说，却因为注重于名理及其名辩的专业研究而为现实政治所鄙弃，被人们冷落，经过秦以后五百年的历史尘封，终于成为“绝学”。

我们从古籍史料中的一些有关名家及其著述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名家是如何从“显学”走向“绝学”的：

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 300 年左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其书五车”，天下名辩之士“相与乐之”（《庄子·天下篇》）。

经过秦始皇的一把火，至东汉班固编修《汉书》时，“名家”已仅七人、遗有著作三十六篇。与此同时，“儒家”则有六十五人、著作一千零六十五篇（包括“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七篇）。

又经过二百年之后，到了公元 3 世纪末，西晋著名学者鲁胜悲叹：先秦时期“世有篇籍”的名家著作已经“亡绝”。

经过长期战乱之后，到了唐代，官家广泛搜集古籍文献，名家的著作仅搜集到“邓析子一卷，尹文子二卷”（《隋书·经籍志》）。当年班固尚能见到的“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唐代奉诏编撰《隋书》的长孙无忌，已经无缘一面了。

为什么名家著作在秦以后大量散佚，以致成为绝学？西晋学者鲁胜归咎于名家的理论太专门、太艰深难懂：“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至于今五百余岁，遂至亡绝”（《晋书·隐逸传·墨辩注序》）。

对先秦名辩思想的研究独具慧心的鲁胜，似乎未能找到名家学说成为绝学的根本原因。名家的著作虽然比较专门、艰深，但是对于学术界来说，并不“难知”，更不会因此而“莫复传习”。在古代经籍中，最艰深难懂的书，首推《易经》，降次《墨经》，然而这两部最为“难知”的书，照样代代相传，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名家著作岂会仅仅“难知”而亡绝？

近代学者伍非百先生，对于名家著作“亡绝”的主要原因，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言道：“因为名家综核名实，观察太

精密，议论太锋锐，虚则虚，实则实，真真伪伪，丝毫不容假借。专制皇帝最怕他们明辨是非，揭露本质，动摇人心。一批所谓正统的学者，也怕他们甚于洪水猛兽。专制皇帝用牢狱、捕快、刀锯、鼎镬对待他们，而所谓的正统学者在辩论真理方面，敌他们不过，就利用帝王的权威，以刑罚禁锢把这派思想扼杀。因此，名家书籍，亡绝得最早最速了”（《中国古名家言·序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自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门户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以后，有许多人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作过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似乎得到了一个西方人注重功利而中国人注重仁义（礼义）的印象，并由此演绎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洋而挨打的结论。其实不然。只要看一看先秦诸子的书籍，哪些代代相传保留了下来，哪些很快便告亡绝，就可以明白：从秦始皇开始，就十分注重功利。大凡对封建专制制度有利的，往往被精心保存起来；大凡对封建专制制度不利的，便弃之如敝屣，甚至着意搜查销毁。《易经》得以完整保存，因为统治者要借重于它向臣民“示信”、“固信”。儒、道两家的著作，乃至农、医等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数千年以来始终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说明任何一家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功利放在首位，而“礼义”只是统治者安定政局的一种手段。每当“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关键时刻，“礼义”便要统治者毫不留情地抛弃一旁，父子相残，兄弟相伐，在“万骨枯”的背景下巧取荣华，在血流成河的残阳里建构新朝。

形名理论，无论对于“朕就是法”的君主，还是对于“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什么功利可言。于是，即便所

剩无几的名家著作，也极少有人问津了。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清代，由于经学家们研究经学须赖他种古籍作为辅佐，而诸子书籍为其大宗，阴霾已久的先秦子书才得以重现光辉，“名家”也因此得以沾光，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

胡适对于“名家”与先秦诸子的文化价值重新被人们发掘出来的前因后果，曾经作过这样一番历史的考察：“汉学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 1987 年影印版第 9 页）

进入 20 世纪，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前驱的西方新文化包括西方哲学蜂拥而入。中国学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品味”，汲取其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儒学派尤其先秦诸子研究汇合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新文化潮流，向数千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学发起冲击。在这股新文化潮流中，以方法论为核心的思维科学，理所当然地扮演了主要角色。于是，将思维形式尤其以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先秦名家，被有眼光的知识分子发掘出来，操起西方逻辑科学这把解剖刀，进行精细的剖析和前无古人的研究，对其逻辑意义、文化价值，作出新的评判。

如果以胡适在 1917 年撰写的《先秦名学史》大致作为近现代名家研究的起点，八十年来，名家研究取得的成果是颇为喜人的。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近八十年来关于名家研究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绝学复苏的契机

名学研究沉寂了近两千年之久，却又在公元 20 世纪开始复苏，从表面看来是一种机缘巧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华夏文化的内部发展来看，导致名家研究“死灰复燃”的原因，首先是清代末期汉学家用全副精力开发诸子学，以致有“婢作夫人”的局面，使得一向被视为诡辩的名家代表人物如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述能够重见天日，并且经过这些汉学家的训诂诠释，能够被年轻一代所阅读。紧接着，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孔子为掌柜的“孔家店”被砸掉，人们一旦由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便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判先秦哲学，尤其对当年被儒家代表人物斥骂过的诸子思想有一种亲近之感。名家代表人物如邓析、惠施，曾经被儒家荀子斥责为“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倡言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注意，成为他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

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发展情况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

期，一大批怀着“科技救国”愿望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国家学成归来，将西方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旗帜的科学思想，包括西方的新旧哲学，大量译介给国人。明末清初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未竟的中西文化汇合的事业，终于在这一代知识分子手里完成了。

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来以工程技术人员公派出国深造，却热衷于译介西方逻辑方法为首要任务的严复，他在重视西方科学的同时，更重视西方逻辑，认为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是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他大声疾呼，中国人不应仅仅学习西方科学本身，更要紧的是要学习西方科学发生的根本——逻辑学。

人们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培根的归纳逻辑中体察到逻辑思维方法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掘。经过一番“品味”，发现先秦时期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学派，正是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类似的中国逻辑学家。于是，名家在先秦诸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开始到现在，对先秦名家的研究经历了八十年风风雨雨，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名家是一个以“名”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派，这个学派以春秋末期的邓析为起点，以战国末期的公孙龙为集大成，前后相继长达三百年之久。被荀子批评为“欺惑愚众”，在近代一度被目为诡辩派的名家学派，其实是我国古代不可多得的逻辑学家，是我国先秦时期创造灿烂文化的主要学派之一。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文化潮流，曾经涌现出了名家这个值得

华夏子孙骄傲的智者汇集的学派；近代历史的浪潮，又洗刷了加诸于名家头上的污泥浊水，还给了它冰清玉洁之身。中西文化的风云际会，再现了名家用智慧点染的迷人风采。

二、名家研究中的新方法

武器的优劣，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青铜器的出现，铁器的出现，都曾经使战争产生质的飞跃。在学术研究领域里，先进的科学文化无疑是学者手里的精良武器，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方法，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效果。

近现代诸子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得着了西方新文化的风气，将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融合到中国传统研究方法之中，尤其唯物辩证法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使得整个学术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的飞跃。而名家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用逻辑学的眼光，看待以“名”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名家学派，用西方逻辑学作为新工具，解剖名家的“苛察缴绕”之辞。

由于诸子书籍经过了长达两千年的阴霾，不像儒家经籍那样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本世纪初的名家研究，一开始便面临着对名家书籍进行真伪鉴别的任务。与清代朴学家不尽相同，近代学者的考据，融合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最典型的代表，是胡适以“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方法论。他倡言“拿证据来”，正是西方学者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结合。他说得这样斩钉截铁：“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